

英国文学史

1870—1955

上

苏联科学院高尔基
世界文学研究所编
秦 水 译
蔡文显 梁植 彭守诚校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英国文学史(上、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0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525,000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8 插页 4

1983年8月北京第1版 1983年8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1,000

书号 10019·3505

定价 2.65 元

出版说明

本书系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写的《英国文学史》第三卷，论述到1955年为止，1958年由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目 次

第 一 章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第一次世界 大战的英国文学	1
第 二 章	罗斯金	136
第 三 章	梅瑞狄斯	159
第 四 章	勃特勒	188
第 五 章	哈代	207
第 六 章	王尔德	285
第 七 章	吉卜林	309
第 八 章	伏尼契	338
第 九 章	莫里斯和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 初的社会主义运动文学	356
第 十 章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 大战时期的英国文学	425
第十一章	萧伯纳	550
第十二章	威尔斯	647
第十三章	高尔斯华绥	686
第十四章	奥尔丁顿	751
第十五章	旭恩·奥凯西	774

第一章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第一次 世界大战的英国文学

1

英国文学中这一发展的新阶段，几乎包括半个世纪。这一时期所创造的作品，在其思想意义和艺术力量上，不及十九世纪初叶与中叶的英国诗歌和散文。十九世纪末叶，英国文学中没有出现拜伦和狄更斯这样的伟大人物。由资产阶级文化危机而产生的各种现代主义派别，在这一时期的艺术中普遍流行。但是英国文学中健康的先进势力，则向这些颓废主义表现进行斗争。尽管进步派的代表人物还占少数，可是捍卫民族文学的优秀的人道主义传统的正是他们。象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勃特勒的《众生的道路》、伏尼契的《牛虻》这样的小说，莫里斯的社会主义论文、诗歌和描写乌托邦社会的作品，罗斯金的政论，萧伯纳的《不愉快的戏剧集》，威尔斯和高尔斯华绥的早期小说，都是对英国民主主义文化的重大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最大胆、最真实的作品，都碰到抱敌对态度的资产阶级批评界的公开抵制。勃特勒在生前不敢断然出版自己的小说《众生的道路》；《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

德》的作者受到极恶毒的诽谤；反动评论界故意避而不谈莫里斯的革命诗歌和抨击性文章以及罗斯金的热情政论，而把他们早期的、比较“无害的”作品提到首要地位；萧的大胆暴露的剧本，受到极猛烈的抨击。这一时期许多杰出的文学现象——伏尼契的长篇小说，布兰特的反帝国主义诗歌，社会主义诗人索尔特的和乔因斯的讽刺诗，特莱塞尔的著名长篇小说，在英国资产阶级文艺研究界的著作中未得到任何的重视。

从宪章运动时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冲突就成了时代的主要冲突，而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几年间，前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在1878—1879年英国又发生了经济危机，丧失了工业垄断地位，在这时候，这种冲突更加深刻化了。日益尖锐的社会政治冲突，对文化的命运起了重大的影响。

照恩格斯的话说，在英国独霸世界市场时代，英国资本家和工人关系上所特有的“彬彬有礼的道德风貌”^①，这时逐渐消失。历次危机，震撼了英国工农业。继六十至七十年代为建立九小时工作制和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以及七十年代的尖锐农业危机所引起的农业无产阶级运动之后，在八十年代，工人运动开始出现新的高涨，工人示威开始形成巨大的浪潮。社会主义思想渗入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政治上的觉醒，具体表现在工人政党的成立上。1881年，成立了英国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民主联盟，1884年改名社会民主联盟。该联盟由于领导方面采取了宗派主义政策，在英国工人运动中没能起重大的作用。1884年，该联盟左派的人物分化出来，成立了所谓社会主义同盟，这是一个由埃维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16卷，第2分册，第264页。

和莫里斯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在八十年代后半期，产生了一些新工会，这些工会联合了比以往要广泛得多的工人阶级各阶层，不仅抱有经济目的，而且抱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在这些新工会运动的基础上，1893年成立了独立工党，这个党如它的名称所表明，它与旧工会不同，是极力想脱离资产阶级政党而独立的。独立工党在团结英国无产阶级方面，起了一定的良好作用，但是它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照列宁的话说，它“对于社会主义是独立，但对自由主义是依赖”^①。从1900年起，工党也开始了自己的活动，工党是独立工党、社会民主联盟和所谓费边社共同组成的劳工代表委员会成长起来的，费边社早在1884年已经组织起来，公开地宣扬阶级和平与协调的机会主义政策。劳工代表委员会的目的是选工人议员入议会。

在八十年代初期成立的这一切政党及其他社会主义和工人组织中，机会主义者起着巨大的作用。

列宁在当初曾指出，“英国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就具备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点：占有巨量殖民地领土，在世界市场上占垄断地位。”^②由于这两种情况，英国即使在丧失了工业垄断地位时，依然能够对抗自己的敌手德国和美国，保持了头等海上强国和殖民强国的威势。资本主义的英国仍旧有很大的准备金来收买上层工人。关于不列颠帝国的特殊发展前途，关于它的地位的特殊性的神话已经动摇，但还没有被粉碎。不仅如此，当时还有人作了许多顽固的尝试来恢复这种神话，使它具有新的性质。

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帝国主义的矛盾产生并加深的时代，英国先进的艺术家英勇地捍卫并发展了现实主义的艺术原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卷，第266页。

^②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卷，第276页。

则，这是和对军国主义与沙文主义的暴露以及反对颓废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出现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逼近，这种斗争日益加强。英国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以及爱尔兰、非洲、亚洲解放运动的发展，在英国的先进文学里都得到热烈的、同情的反应。英国先进文学在八十至九十年代所经历的那种高涨，是和人民对反动势力的回击的加强相联系的。

恩格斯在他致哈克纳斯的著名信件中，认为“工人阶级对于压迫他们的环境的革命的反抗”，工人“想恢复自己的人权的渴望……都是属于历史的一部分，因而可以在现实主义的领域中要求一个地位”^①；这封信里所表现的思想，是先进文学在这些历史条件下发展的全部纲领。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先进作家，由于他们的见解和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对不公正的社会制度的不满，因而继承了并在某些方面发展了现实主义社会小说和革命浪漫主义诗歌的优秀民族传统。归根结蒂，这也决定了威廉·莫里斯体现人民对于未来的公正社会制度的幻想的乌托邦作品中蓬勃的革命浪漫主义热情，以及哈代小说对普通劳动者的描写中充满热情的人道主义；这也决定了哈代的小说、萧的戏剧创作和政论中对资产阶级道德的暴露的严峻力量，以及梅瑞狄斯、勃特勒、威尔斯、高尔斯华绥的优秀作品中对于利己主义者和伪善人物世界的谴责。

可是，对抗的阶级间的矛盾，无产阶级政治积极性的提高，使远离人民的作家惊惶失措，因而加强了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创作中张牙舞爪的反民主倾向。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册，第9页，译文略有改动。

消遣性低级读物的供应者(瓦尔特·比赞之流),企图向工人灌输事业上劳资合作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有利的说法;他们描绘了阶级和平、“善良的”资本家和“驯服的”工人之间的和谐与相互理解的虚伪、蛊惑人心的图画。

自然主义派的作家,对为资产阶级辩护的文学的粗糙虚伪深感厌恶。他们描写生活黑暗阴森方面的作品内容,推翻了关于下层人物的幸福以及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关系上的“误会”能够很容易地消除的神话。但是,自然主义者片面地描写生活,与其说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冷酷和贪婪感到愤怒(他们把冷酷和贪婪解释为人性中素有的特点),不如说他们被革命的威胁所吓坏,因为他们认为革命是危险而没有意义的。自然主义者吉辛在短时期肤浅地醉心于社会主义思想后,就在小说《民众》中,对工人运动进行诽谤;莫里逊把反抗分子描写成无赖流氓。

自然主义者从现实的矛盾中找不到出路而陷入绝境。唯美主义派(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拉斐尔前派,八十至九十年代的象征主义派)的作家们提出了臆造的出路。他们闭目不看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企图逃避生活而遁入他们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他们否定现实主义,用他们那种脱离生活实际、丧失认识价值而沦为游戏的艺术来与现实主义相对立。这种艺术的原则,特别鲜明地表达在象征主义派的首领奥斯卡·王尔德的文学宣言上。同时必须指出,这些作家中有许多人自己也意识到他们所提出的摆脱现实矛盾的道路的虚幻性。

“新浪漫主义派”作家(史蒂文生、康拉德)企图用鲜明的、英雄主义的生活的宣传,来与唯美主义者的丧失意志和消极态度相对立。但是这些作家脱离人民,极力想把脱离集体、脱离社会的高傲人物说成是英雄,因而往往趋于颂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自然主义派、唯美主义派和新浪漫主义派作家，在实质上是向资产阶级的现实矛盾投降的，因为他们都认为这些矛盾是永久的、无法消除的。

这个时期有些作家在口头上宣称自己是颓废主义的敌人，发出了“健全”艺术的蛊惑口号。这就是吉卜林、汉莱、科南·道尔、哈加德、戴维逊等积极支持英国统治阶级侵略政策的文学家。他们的作品中，不写工人问题，而写整个民族与“低等的”殖民地民族的“对立”问题，写这些民族的隶属于不列颠帝国的问题。这些作家企图利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各民族与宗主国民族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矛盾，来转移国内对工人问题和尖锐的社会冲突的注意。

1871年巴黎公社的种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大大促成了这时英国文学中各派势力的分野。主要是由于国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这些事件才在英国获得了热烈的反应，并在英国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迹。

列宁写道：“公社在欧洲掀起了社会主义运动，公社表明了国内战争的力量，公社驱散了爱国主义的幻想，破除了对资产阶级的全民意愿的天真信任。公社教导欧洲无产阶级具体地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①

英国资产阶级对公社自然采取强烈的敌对立场。反动报刊故意歪曲事实，企图煽起英国普通读者反对巴黎公社社员的情绪。

英国的无产阶级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在一起，把公社当作自己切身的事情。列宁在论巴黎公社的意义时写道：“巴黎的炮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3卷，第455页。

声，惊醒了无产阶级中还在酣睡的最落后的阶层，到处对加强革命的社会主义宣传起了推动作用。”^①英国无产阶级对巴黎公社事件的回答是群众大会和对法国无产阶级表示热烈的同情。

恩格斯在1871年7月在伦敦写道：“自从伦敦存在时起，还没有一种报刊文章象《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产生那样强烈的印象。”^②固然，必须指出，有一部分工会及其领导者，包括某些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工会及其领导者在内，被拥护巴黎革命者的广泛运动所吓坏，慌忙脱离了“叛逆者”。

巴黎公社的事件与经验，在英国各对立的文学流派的创作中，获得了原则上不同的阐述。^③

反动作家不隐讳对巴黎公社社员的仇恨。布尔威在他的小说《巴黎人》里，把革命的巴黎描画成一幅恶毒的讽刺漫画。史文朋过去本来站在共和主义的立场，这时对公社社员也持敌对态度。

巴黎公社无疑地对进步作家起了良好的影响。约翰·罗斯金在他的名著《劳动者的力量》(Fors Clavigera, 1871—1884, 该书是作者致英国劳动者的书信集)里，大胆地捍卫公社社员。诗人哲拉德·曼莱·霍普金斯在巴黎公社事件的直接影响下，于1871年8月致诗人布里治斯的信中，写下下列出色的词句：

“我必须向你承认，我经常想着未来的共产主义……我担心，某种大革命不远了。我恐怕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共产主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7卷，第12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13卷，第2分册，第349页。

③ 现在英国先进的社会舆论，异常重视巴黎公社的经验对英国文学所起的作用，如杰克·林赛的论文《巴黎公社与英国文学》就论述了这一问题。该文载于1954年的《马克思主义季刊》(Marxist Quarterly)。

义者。”^①

霍普金斯的这种自白，尽管有所保留，可是未来的桂冠诗人布里吉斯仍然认为他是个叛逆。

在以后许多年里，巴黎公社不仅是许多艺术作品的题材，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使先进作家中的反抗情绪有所加强。

巴黎公社的事件明确地指出，在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失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冲突仍然是时代的主要冲突，在1871年初次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将争取生活条件的根本变化。

象莫里斯这样的诗人的革命热情，是和认为巴黎公社的事业不死、工人阶级必然胜利的信念分不开的。

巴黎公社的英勇尝试，对十九世纪末英国社会主义新文化成分的形成，起了不小的作用。莫里斯把到巴黎去为公社的事业而战的英国人，作为他的长诗《希望的历程》(1886)的主人公，决不是偶然的。1889年，社会主义者诗人吉姆·康奈尔创作了英国工人最流行的革命歌曲之一——《红旗》。据他自己说，他深受巴黎公社的影响，所以才创作这首歌。^②

还可以举出爱尔莎·林顿（宪章运动领袖林顿的妻子）的长篇小说《基督徒和共产主义者约书亚·戴维逊的真实故事》(The True History of Joshua Davidson, Christian and Communist)，该书出版于1872年，小说的主人公是巴黎公社社员的战友。威廉·林顿本人也挺身捍卫巴黎的革命工人。

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在资产阶级文化危机的条件下，英国

① 《哲拉德·曼莱·霍普金斯致罗伯特·布里吉斯书信集》，亚伯特编，牛津大学出版社1955年伦敦版，第27页。

② 汤姆·曼：《回忆录》，国家出版社1924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64页。

文学中民主阵营的代表人物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民族艺术的优秀传统。但是，这个过程也不是没有矛盾的。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文化的危机，也影响了当时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

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几年的现实主义作家：梅瑞狄斯、勃特勒，特别是其中最著名的哈代，继狄更斯、萨克雷及其战友之后，在本世纪中期现实主义小说的优良传统中加进了新的特点，不过他们同时也往往比不上“出色的一派”的艺术成就。

梅瑞狄斯使萨克雷和狄更斯那样精通的讽刺武器更加锋利；他的作品中对人的心灵活动的细致分析更为精密，对主人公行为的心理动机的说明（在晚期的狄更斯作品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显露这种迹象）更加深刻。梅瑞狄斯对英国文学长篇作品中所特有的广泛的史诗题材依旧保持着兴趣；他的优秀作品充满抗议精神，书中出现了叛逆的形象（山德拉·维多利亚、包尚）。但是，梅瑞狄斯描写生活的领域大为缩小，他讽刺的对象往往被庸俗化了，社会问题研究的范围不那么宽广了。

梅瑞狄斯特殊的心理分析小说，是十九世纪英国散文史中的新成就，它是英国小说发展的重要环节，特别是二十世纪英国一位最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的小说发展的重要环节。同时，这种小说被二十世纪专以心理描写为目的的现代主义派作家捧上天去而且认作典范了。

以托马斯·哈代的优秀小说为例，最容易看出十九世纪末的英国现实主义艺术在与狄更斯和萨克雷的创作比起来，继承并发展了什么东西，丧失了什么东西。

哈代保持了他前辈的创作的基本方针。哈代的无情批评，往往一直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他远比梅瑞狄斯或勃特勒更接近十九世纪中叶的现实主义者，他有成效地发展了“出色的一

派”的小说家暴露社会的创作路线，即认为社会灾难的原因，不在于个别人而在于整个社会制度的思想。

在哈代以及十九世纪末一些西欧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中，这种思想表现得特别明显。在狄更斯、萨克雷和与他们相近的作家的小说中，资产阶级世界是以个别资产阶级典型代表人物的极令人厌恶的形象来体现的。在哈代的描写中，恶仿佛成了“超个人的”，被认作整个社会制度的有机构成部分；恶的体现者是环境所造成的丧失人格的人。例如，哈代的优秀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中的亚雷·德伯和安玳·克莱都不是出于有意识的罪恶动机而毁坏了苔丝的生活，陷她于死地。

这样的描写方法是哈代和当时其他某些人的现实主义的艺术特征，即认为社会的罪恶和不公正的现象，不一定与个人的罪恶意图有联系。这种处理方法，不用讽刺手法或作者的直接品评就可以谴责反面人物。这些表现社会罪恶的新方式，丰富了现实主义的表现力。但是哈代由于把社会制度看作罪恶的根源，就常把社会矛盾作特别放大的特写。因此作者往往趋向于黯淡的、无前途的悲观主义。在他的小说（特别是晚期的小说）中，由社会所决定的尖锐矛盾，往往带有悲剧性的走投无路的色彩。

尽管哈代的创作带有悲观主义的性质，但他与颓废主义者仍然是大有分歧的。他对人有信心，把人的创造力量加以诗化，赞扬普通人的善良和自我牺牲精神，肯定这些人有享受自由幸福生活的权利。哈代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愤恨的热情，鼓舞了他的创作，可是这种热情与他自己的“世界罪恶”的虚幻观念却发生了冲突。

哈代在描写当时的道德冲突时，表现了远远超过前人的大胆。在他最重要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中，那

些占中心位置的形象和情节都是狄更斯、萨克雷、夏洛特·白朗蒂和盖斯凯尔只敢极含蓄地一提的。

必须指出，维多利亚的禁令曾宣布某些题材为“淫秽”而予以禁止，这一禁令对十九世纪中叶现实主义者的创作起了一定的影响，哈代却以战斗的人道主义姿态，破坏了这一禁令。哈代的创作和十九世纪末被资产阶级通称为“反维多利亚主义派”而往往带有颓废主义色彩的那些文学流派的区别就在于此（那些流派以公开的享乐主义和色情与维多利亚派古板的道德主义相对立）。

哈代还有一种与他的前辈现实主义者不同的特征，就是他在创作中赞扬十九世纪初革命浪漫主义者的诗篇中的反上帝精神。

勃特勒气魄较小，而且与哈代不同，是个远离人民的作家，他的创作中现实主义倾向和自然主义成分互相矛盾地结合在一起。

勃特勒对生活的描写，乍一看来似乎比狄更斯和十九世纪中期其他现实主义者更为无情。勃特勒认为生活比他的前辈作家所想象的要简单，其中有着更多的粗暴和庸俗的东西。罪恶在生活中不是例外，而是正常现象。勃特勒摧毁了维多利亚道德的基础，他证明资产阶级家庭——这个资产阶级国家所理想化的支柱，事实上只不过是伪善、利己主义的策源地，而宗教则是欺骗。但是，勃特勒的批评是看不出人类前途的。他死后发表的那部小说，情节不复杂而故意求平凡，主人公也庸俗乏味，书名却是意味深长地叫《众生的道路》，书中把社会罪恶写成是与任何人的生活都分不开的微小而平常的东西。

在狄更斯、萨克雷和他们的战友的作品中，可以感到作者对

人类的尊严的信心、对社会现实可能改变的信心，他们的离奇讽刺是对罪恶的玩笑式的判决，他们认为罪恶必须消灭，因为罪恶是丑恶的，反自然的。

可是在勃特勒看来（在这方面他也接近自然主义者的美学），罪恶是不可消灭的通常现象。他那犬儒主义的宿命论和自然主义者的宿命论，正是一类的东西，勃特勒由于脱离人民，必然会陷入怀疑主义和绝望的情绪。

勃特勒创作的有力方面，对萧和高尔斯华绥这样的批判现实主义者的创作起了一定的良好影响。

在哈代、梅瑞狄斯、勃特勒以及后来的萧、威尔斯、高尔斯华绥的创作中，在十九世纪末英国先进文学的创作中，与发展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也出现了新的倾向。从八十年代起，在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高涨时代，社会主义思想也开始渗入文学。

十九世纪的欧洲在巴黎公社之后到来的比较“和平”的时期，特色是马克思主义的流行更加广泛，社会主义思想更受欢迎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立。照列宁的话说，这是“聚集和团结无产阶级的力量，准备无产阶级去作未来的战斗”^①的时期。

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与社会主义运动有关的作家——莫里斯、政论家和批评家埃维林、社会活动家和政论家汤姆·曼、许多社会主义诗人，都受到他两人的影响；哈克纳斯与社会主义运动接近，曾和恩格斯通信。

八十年代的这个运动使诗歌和散文、文学批评和政论活跃起来。除了莫里斯之外，大多数社会主义作家（索尔特、乔因斯、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卷，第583页。

布兰姆斯伯利等)的作品,在艺术上是不完善的。但是这种文学由于发展了革命浪漫主义和宪章运动诗歌的某些传统,以新的方式提出了劳动人民及其为社会正义而斗争的伟大的题材,所以仍无疑有它的重要性;在这种文学中显露出与社会最进步的阶级有关的新艺术的最初萌芽。

社会主义思想在远离工人运动的作家——例如,约翰·罗斯金,甚至霍普金斯和奥斯卡·王尔德的创作中,也得到了反应。

以空想形式而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影响了约翰·罗斯金晚期的政论,这时他的政论中含有对资本主义尖锐的、尽管还不彻底的批评。

奥斯卡·王尔德由于对社会感到不安而进行苦痛的探索,终于产生了对现实必须实行社会改造的思想。他对于不以私有原财为基础、个人有发展自己天才的广阔天地的社会制度的幻想,在他那鲜明的、但有矛盾的论文《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心灵》里作了说明。

但是,英国的机会主义思想的势力是很强的,先进思想对接近社会主义运动的许多作家的影响是肤浅的、偶然的。吉辛一度与社会民主联盟有联系,短期间肤浅地醉心于社会主义。这个联盟的成员哈克纳斯企图把马克思主义与“救世军”的资产阶级慈善思想折衷地配合起来。在萧的政论和剧作以及威尔斯的某些社会小说中,社会主义的理想,决定了对私有制社会暴露的激情,和对丑恶的社会生活条件抗议的力量。但是,他们所属的费边社的政治纲领的机会主义性质,却往往对他们的“社会主义”空想作品和方案起着消极的影响。萧和威尔斯的优秀的、最珍贵的作品,都是由于他们忠实于现实主义原则(尽管他们与费